

民俗采风

儿时的年味

王文明

小孩盼过年，老来怕年来。对于即将迈入60岁本命年的我而言，说不上盼和怕。母亲去世还没烧满三周年，担心回去伤感，这个年只好留在京城了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进入冬月不久，年就在我心里不停回味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过年的快乐时光，想起母亲过年时的忙碌身影，想起家乡小山村过年的喜庆氛围。

——

胶东人把春节叫“大年”。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腊月二十三“小年”后，过年的气氛就更浓了。真正的年味从杀猪开始。以前日子再穷，过年也是要杀猪的，全村吃一头猪，每家也就两三斤肉。记得土地承包后有钱了，有人扛半扇猪回家，老人们直叹气“真是不过了”。腊月二十五、二十六后，大人们忙着大扫除、劈柴禾、磨豆腐、做饽饽、炸面鱼、烹丸子，置办各种年货。

对我们小孩子来说，过年不仅可以穿新衣服、吃好吃的，还可以放鞭炮、领“压腰钱”，更开心的是可以尽情玩耍。小伙伴们一放寒假就把沉重的书包扔在一边，三五成群地嬉闹，男孩或打瓦、或打“丧门神”、或打陀螺、或下“五虎”，女孩或跳房、或拾“巴骨”、或踢毽子。我们农村孩子的乐趣虽然土了点，但也是丰富多彩的。

过年最隆重的自然是大年三十。首先是贴春联，谓之“封门”，心急的头天就贴上了，实际上大年三十上午贴春联最好，用面粉熬的糨糊贴最结实，春联内容自然都是些好词好句好寓意，在照壁及显眼的地方则一定要贴“福”字。贴窗花、挂灯笼、挂挂历，是后来条件好了才有的。

大年三十最重要的要数祭祀。过去全村有个家庙（祠堂），里面挂着祖父写的王氏族谱，摆放着先祖的牌位，姓王的人家轮着操办祭祀活动，可惜“文革”把家庙作为“四旧”给破了。以后的祭祀都是各支或各自家里进行，除了挂族谱、请牌位、摆祭品，还要准备好磕头的蒲团。平时家里再穷，肉、鱼、鸡、水果、点心等祭品也是要摆满满一桌子的。祭祀不仅在堂屋，还有院子，因为敬老爷要在露天的院子里，过去是用席子扎“天地棚”，现在则用个小桌子代替。这事神圣而严肃，都是大人做，小孩在一边看，并且不能随便说话。

晚上放过鞭炮后，全家就一起吃饺子。大人们饭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母亲要准备好迎接“五更”别人来拜年的东西，还要包好初一早上吃的饺子，继父则烧烧纸、续续香，把炕摆弄得热乎乎的。至于看春节联欢晚会，那是1983年才开始的事了。

大年三十的整个白天，对小孩子来说是兴奋的，是欢笑的，是跑跑颠颠一身汗的。当大家你追我赶玩得正起劲的时候，突然从大队院子里传来一阵阵锣鼓声，紧接着是此起彼伏的狗叫声。“要送光荣灯了！”领头的一声喊，小伙伴们撒丫子就跑，有鞋带开了鞋子飞出去的，有把新衣服弄得净是泥的，有鼻涕顾不得擦的，还有故意点个“二踢脚”弄出响的，用不多一会儿，几路兵马就汇聚在大队部了，五六条狗也尾随而来。

所谓送“光荣灯”，是大队过年前统一慰问军烈属，每家除了送一个灯笼，一般还有一副春联、几斤肉。东西不多，但形式隆重、意义重大。

吃完大年三十的饺子，我们兄弟姊妹被母亲逼着抓紧歇息，或者干脆“守岁”不睡觉。当钟摆敲响十二下后，就迎来了过年的最高潮：拜大年。这是农村一年中最重要的民俗活动，俗称“问道好”。朦朦胧胧爬起来，首先问父母好，接着穿新衣服。记得有一年挨到年根了，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割布料做衣服，母亲只好把旧衣服洗干净让我们穿，结果兄妹几个委屈得直掉眼泪，文鹏弟弟还赌气不吃饭。为此母亲难受得要命，心想再穷也要让孩子过年穿上新衣裳。母亲说到做到，从那以后，每年过年我们都有一套崭新的衣服。继父和母亲在家接待来拜年的人，等天亮他们再去给本家的长辈拜年。凌晨一点左右，我和弟弟在父亲的“牌位”前磕了头，到院子里给“老天爷”磕完头，匆匆吃几口芋头、

儿时拜年的印象是深刻的，回味中有甜蜜也有酸楚。去本家长辈家拜年，一般都能得到一两毛的“压腰钱”，条件好些的能给到五毛，一早晨下来能收入好几块呢。不好意思人家一给就接，当假装推辞不要时，长辈们总会说“听话，拿着，好好念书”。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温暖。这“念书的钱”，母亲是不会没收的。

那些年实在太穷，虽然知道“鞭炮放得越多，来年的福分就越大”，但家里还是从来不会多买。母亲算计得很清楚，两个叔叔都能给一挂，海阳北水头舅姥爷能给一挂，杨础姥爷能给一挂，自己家象征性地买两挂，保证三十晚上和正月初一早晨有放的就行了，正月初二“送神”、正月十五、二月二的鞭炮都在预想和计划之中。

其实好多人家家里都没有多少鞭炮放，小伙伴们就养成了“五更”拜年时，每到一家先在人家院子里捡

大。通常由大队干部带队，七八个人的锣鼓班子，一户一户地走。离军烈属家三四十米时，锣鼓队就开始敲敲打打，并且越敲声音越大，直等到户主笑盈盈地出来才停下。大队干部送上慰问品后，户主都要递烟感谢，锣鼓手们欣然接受，抽不了的就夹在耳朵上，显得很神气的样子。小孩每人一块糖，碰到条件好的还可能给奶糖，真是只有吃了奶糖才知道什么叫香甜。几条狗就没有什么赏赐的了，只能一个劲地流哈喇子。

当户主客气地让来人们到家里坐坐时，干部总是婉言谢绝，说晌饭前要跑完。于是掉转队伍，干部在前，锣鼓手紧随，大人们评价着烟的

豆腐和鱼（母亲说分别象征有余、有福和清醒），就心急地提着灯笼出门了。

印象中除夕夜里、初一凌晨，往往都是很冷的，下雪的年份还比较多。穿着新衣走在大街上，不时传来鞭炮和“二踢脚”声，闻着浓浓的硫磺味，耳边经常飘来句“过年好”，就根本觉得不冷，反而像有股暖流似的。街上的很多人，但一点也不乱，成群结队的，成年男人们一帮，年轻小伙一帮，姑娘们一帮，小男孩一帮，小女孩一帮，走在一起的是本家堂兄弟或堂姊妹。每年拜年我和弟弟文鹏都是与文松、文强、文涛、文建几个堂兄弟一起，由会元大伯和孟元二叔、仁元三叔带我们到几个本家长辈家，后边的行程就是文松大哥领头了。

拜年的次序很讲究，先到供有族谱的本家磕头祭拜先人，接着是

四

哑鞭炮的习惯。看到谁家院子里厚厚的一层鞭炮纸，就羡慕和兴奋得很，赶紧跑过去扒拉起来。这些没响的鞭炮可是宝贝，有捻子的可以再单独点放，没有捻子的可把火药弄出来，装在“洋火枪”里打出啪啪响声。

以前的日子都是精打细算，母亲不光是鞭炮算计买，糖块也不舍得多买。我和文鹏弟弟拜年还有个重要任务，兜里的糖满了就抽空跑回家倒出来，一早晨能装回三四兜，母亲正月招待来客就不用愁了。说来难以理解，我的儿子浩博小时候还爱放鞭炮，曾经把街门东边的草垛和鸡窝给引燃了，还特别喜欢把一个破铁碗扣在炮仗上，能打两三米高，但稍大一点就懒得放，对糖块更是早就不感兴趣了。或许是现在不仅过年买东西，就是平时也不用那么算计，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了，一年365天天天在过年。

别说下一代，就是我自己，也总

好耍，小孩叽叽喳喳，几条狗跟在后面摇着尾巴，浩浩荡荡的队伍又出发了。等快到下一家时，锣鼓又开始响起。全村转下来，需要大半天，但我们摸摸兜里五颜六色的糖块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

临近过年，除了跟着大人“送光荣灯”，让小伙伴兴奋的事还有不少。比如，乡亲们自导自演的京戏和吕剧，虽然演得不怎么专业，但现场笑声总是不断。与邻村青年篮球比赛，我们小孩的加油助威比场上队员还卖力，不到半场嗓子就喊哑了。老先生和小学老师写“福”字写春联的旁边，也少不了我们崇拜的眼神，淘气的总能沾一脸墨。

到本家五服内的，再就是本族本份，最后是街坊邻居。每家都在炕上摆着盛满酒菜的“圈盘”，小点心、炒花生、炒栗子、瓜子、水果和糖块等则放在小筐里，岁数大的长辈坐在炕上接受拜年，儿媳站在地面上等候和送别来拜年的人。进门问了“过年好”后，主人都会热情地招待平时喜欢酒的大人喝几杯，给抽烟的人分烟，给小孩子们发各种吃的。大龄单身青年这个时候往往很难受，本家长辈总是关心地询问并催婚。走在街上，总能看见几个喝多酒东倒西歪的人，或许是平日没有酒喝，或许是喝得太急，或许是碰到酒友杠了起来。

等一家家走完，天也就放亮了，感觉能跑大半个村子。每次回来后，母亲总是细心地问我们，“谁谁家去了没有？咱两家从老辈关系就好啊”，生怕漏了哪家显得不尊重。

感觉过年没有以前有意思，在城里过年就更加单调乏味。城里一到过年，许多人选择回老家或外出旅行，在北京家门口的复兴路，一过腊月二十五就从车水马龙变得人少车稀。当今用手机发信息、发微信拜年，打电话、打视频拜年，是方便快捷了，但过于程式化，也显得平淡无味。

前两年流行的微信红包，看似热闹，实则无趣。在城市，就是一栋楼甚至对门邻居也不会上门拜年，这和儿时提着灯笼、打着手电筒，踩着咯吱咯吱的积雪，听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满村“问道好”的农村，又怎么能相比呢？

2024年，春节成功入选世界非遗名录，这是中国人的大喜事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，都需做好弘扬传统文化这篇大文章，让年过得更有生机、更有温度、更有年味。而这个年味，不仅在于满足物质需求，更体现在精神层面。